

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的构建与进路

邹国庆

(吉林大学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企业的发展, 迫切需要建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建构必须经历科学研究过程, 坚持严格的理论建构和实证方法; 强化问题意识, 以科学的问题为导向, 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嵌入中国现实背景下, 进行情境化性研究; 必须把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情境因素作为重要变量; 以问题为中心, 开展跨学科研究, 为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独立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 科学研究; 理论建构; 嵌入情境; 问题; 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 F224.0

文献标识码: A

目前, 中国管理研究相对滞后, 还没有能够融入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 中国管理研究基础相对薄弱, 特别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及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方面, 与西方管理研究存在相当的差距。由于缺乏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传统, 长期以来, 管理学研究一直局限在思辨上。近几年来, 中国管理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运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进行了管理研究, 但在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方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中国企业的发展, 迫切需要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在中国背景下进行本土的管理研究。必须建构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下的管理理论, 更有效地指导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建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通过科学研究的途径; 管理研究必须遵循科学方法, 坚持严格的理论建构和实证方法, 二是应强化问题意识, 以科学的问题为导向。三是基于中国现实嵌入性研究。必须把情境因素作为重要变量, 四是以问题为中心, 开展跨学科研究, 深刻揭示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社会网络下具体情境中的现象。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历史地)建立本土情境相关的(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结构等)且有意义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1 理论构建过程

为什么要建构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 因为这种理论能帮助我们认识、探索中国转型经济下独特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方式; 帮助我们获取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经验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方式的知识; 使得这种知识不仅仅在个人经验上有效, 而且形成企业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普遍有效的系统性知识; 发挥指导中国企业实践的功能。

什么是理论? “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概论系统或类型, 它必须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或变量的命题”¹。理论可以看作是“一个概念或者变量系统, 通过命题将概念相互联系起来, 而通过假设将变量联系起来”²。因此, 理论是建立事实之间的概念联系, 是对于表达各种事实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研究。理论必须是具有结构与秩序, 即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以及能与解释、预测经验真实。

理论的构建依赖于科学研究过程。科学研究是指遵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普遍认可的科学逻辑的研究方法。³其目的之一是检验理论及发展理论, 即整理、继承知识和创新发展知识。科学研究必须遵循归纳和演绎两条途径来构建理论。运用演绎逻辑根据实证数据检验和发展现有的理论, 运用归纳逻辑通过实证性的概念化过程观察规律以构建新的理论。理论与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不停息的从归纳到演绎、又从演绎到归纳的互动过程。科学研究逻辑过程可由下面的模型来(见图1)概括, 它表明了科学研究是从理论→假设→观察→经验概括→理论的无限循环过程。科学轮

的左半部分表明了运用归纳逻辑建构理论的过程：从经验观察开始到一般的理论解释：（1）不做理论假设而直接进入实地考察；（2）描述实际发生的现象和事实，用一系列经验命题的方式加以陈述；（3）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找出最有概括性的命题，由此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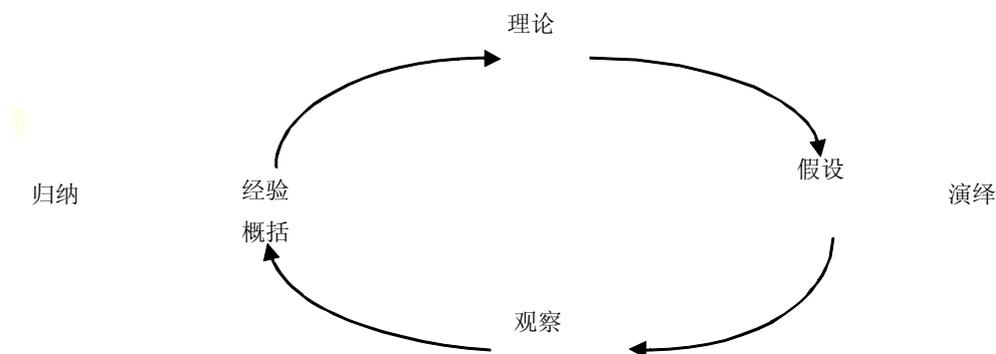


图 1 科学轮

资料来源：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 华夏出版社, 2005. 10.

科学轮的右半部分是运用演绎逻辑建构理论（检验或改进理论）的过程：从既有理论开始到研究假设、资料论证：（1）界定研究问题，确定理论的基本主题。（2）通过文献回顾，了解与主题有关的经验知识。（3）运用思辨方法，依据理论观点做出假设；（4）对概念做出操作定义，即用变量和指标来表述概念的内涵。（5）选择研究方法，（6）观察与资料收集。（7）用经验资料检验理论。主要方法是从理论命题严格推演出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来搜集新的经验资料,检验或改进理论。演绎逻辑建构理论的过程逻辑体系比较严谨和客观，如果研究问题恰当，前提假设真实，推理逻辑正确，则结论必然是可信。这种方法在形式上比较完美、严密,因此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的理论建构采用假设—演绎法来建构理论，尽管基于归纳逻辑的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的在学术界的影响正在日益显露出来，但演绎逻辑建构理论仍然是西方管理学的主流研究模式与理论范式。

2 演绎式理论建构及操作化

理论是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通过假设将变量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可见，概念、变量、命题和假设是构成理论的基本要素。

概念是对特定事物进行归纳，对其现象的一种抽象，它是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属性在人们主观上的反映。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本元素，正是经过逻辑地联系起来的概念形成理论。

变量是概念的经验性对应物。是能够在研究中测量或控制的现象和事实，它们连接着经验范畴和理论范畴。是在某个范围内的不同取值的概念（变量的取值是在某个范围内，有多个可能的值）。在管理研究中，理论也可以说是由变量语言构成的，其目的是描述不同变量及其不同属性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逻辑的关系。

命题指的是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两个以上概念或变量关系的陈述。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概念。但理论是通过命题把概念连接起来而构成。命题通过陈述使概念相关联，即由概念构成命题，命题则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而理论则是由一组命题所构成的。

假设是管理研究中最常用的命题形式。假设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的命题。如同变量是概念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假设也是命题的特殊形式，是

尚待验证的命题。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是与假设而不是命题打交道。在大量的管理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往往都可以归结到探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上。因而常常需要提出假设和检验假设。通过对于变量进行清晰的界定，根据概念和命题提出可以验证的假设。

上面提到，变量是能够在研究中测量或控制的现象和事实，它们连接着经验范畴和理论范畴。因此，科学研究要描述和解释事物之间的关系，必须界定原因与结果的逻辑与结构（自变量与因变量），假设给出了因果的逻辑的陈述，并且使其关系确切而不被其他因素干扰和混淆（控制变量），知识建立在变量的逻辑与结构基础之上，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因果关系及其复杂，其中，要解释变量之间背后存在着的互相作用及影响的机制（中介变量），又要规定其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调解变量）。一个理论必须详细说明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调解变量的关系，理论提供了这些变量如何相关以及为何相关的理由和逻辑⁴。假设与变量是科学研究与理论构建的最根本的基础。上述概念、命题、假设、变量之间的演绎逻辑结构可通过下面的实证研究过程模型表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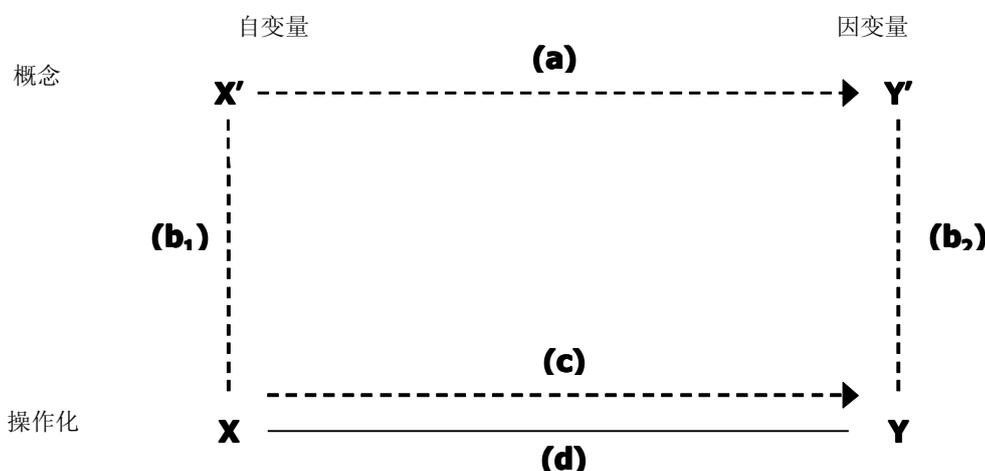


图 2 演绎逻辑建构实证过程

资料来源：Schwab, D. P. (1999). *Research Methods for Organizational Studie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代表变量，(d)表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表明：通过概念 X'和概念 Y 等一组假设图 2 中 X'、Y' 代表概念，(a)表示概念 X'和 Y'之间的关系，(b1)、(b2)表示操作化过程，X 与 Y 代表变量，(d)表明不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表明：通过概念 X'和概念 Y'等一组假设关系形成命题，要验证假设关系，检验 X'和 Y'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把抽象的概念(X'和 Y')变成可以测量的变量，即操作化（将理论层次命题中的概念转化为实证层次假设中的变量），唯有经过此种转化，才能将实证层次的事实验证命题中的假设。通过操作化(b1)、(b2)转化为可以测量的变量 X 与 Y。在此过程中，必须详细说明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调解变量的关系，即把一个抽象的研究假设转换为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的具体问题。然后，通过概率抽样的方法选择样本，使用经过检测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来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有时还要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比较，进而检验 X 与 Y 间是否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系（如线(d)所示）进行验证、检验。若 X'和 Y'之间显著关系不存在，接受零假设；若 X 与 Y 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甄别各种可能导致 X 与 Y 之间发生因果联系的替代性。这就是演绎式理论建构研究的一般过程。

3 问题与理论基础

随着国际主流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被逐渐认同和广泛接受,同时也出现了实证研究表面化、形式化的倾向: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对一些缺乏价值或没有意义的问题进行空洞的“纯学术”研究。理论缺乏必要的概念和范畴;数据观测、收集和分析工作缺乏理论针对性,贫乏的理论加上不确切的经验事实及数据,因为“实证”过程而貌似科学。在目前的管理研究中出现的方法的泛滥与理论的匮乏的现象,其关键问题一是学术研究仍然缺乏问题意识,二是缺乏对现有理论的深刻理解、把握、继承和批判。

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长、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问题”是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没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具有问题意识是对学术活动主体的基本要求。

管理学研究中首先是确定研究问题和界定问题。问题是科学研究过程的开始,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是跟着问题走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不是为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最优化解决方案⁵。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说过,“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⁶管理理论建构是对以往的理论进行整理或知识发展的科学研究的过程,研究问题与现有的理论与科学研究程序同样是决定一项研究价值的重要因素。提出问题是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一项研究的理论贡献和实际意义。

在目前的管理研究中,一些论文或论著存在没有问题、问题陈旧、问题不恰当或模糊不清的情况,深层原因是研究者并不注重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前提,问题的提出没有前有理论和相关知识的连贯性,而是把凭借想当然的个人直觉作为学术思想的预设。以至于那些问题并不构成恰当的科学研究的问题甚至不是真实的问题。什么是管理学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问题指的是一项科学研究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它是一个可以通过研究来进行回答的问题。不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问题”或“现象”。它应该具有“真”、“客观性”、“可证明性”等特征。

首先,“真”是指问题应该具有价值性。

研究的问题应该反映“社会现象本性,应该是有学术意义、学术潜力和学术价值的“正确”问题,能够与相关理论构成对话的“有趣的”问题。问题的解决能够克服本领域现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对目前的知识进步做出潜在的贡献⁷;这就意味着问题预设应基于扎实的理论基础。提出问题应建立在对现有理论的深刻理解之上。问题是对理论的质疑或不满引出的,即问题都是在一定的科学理论和相关背景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批判性地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是研究中形成问题的环节。通过找到现有文献中存在的有待发掘、存在漏洞或空白的地方⁸,针对已有的理论,找到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问题的解决能够增加知识和发展理论⁹。任何一项研究都是原始资料、现有理论和研究者本人知识三者之间的一个既循环往复又交错作用的互动过程¹⁰。

研究的问题应该具有应用价值或潜在的应用价值。通过把现实中的疑难现象转换成关于概念或变量间关系的疑问,通过问题的解决能够对现实中的迫切需要做出迅速的、有力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回应。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在于问题是否具有根植性或情境化。问题的根源是客观事物,一个研究的问题总是来自一定的研究现象及有关的事实根据。问题必须建立对本土现象的深刻洞察之上。忽略来自于情境中的问题,我们就冒着没能问正确问题的风险¹¹。中国管理研究要构建本土情境下管理理论,研究的问题必须产生于中国特定情境与历史语境下的现实,应该是能够最好地表达中国社会文化客观现实的真问题和重要的问题,既要善于从文本中发现问题,更要善于从中国特定文化制度条件下发现和提出问题,只有提出、追问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才有可能成为本土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把中国情景下的特殊的历史经验理论化,才能做出独立的理论贡献,通过对来源于中国企业问题的研究和解释,从而对中国企业实践提供指导。因此,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必须以中国的历史特征和价值观体系、制度体系、社会关系结构作为参照体系。

其次,“客观性”是指问题陈述是基于事实判断而不是主观价值标准。

即“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问题是否具备客观性与研究者自我价值认同相关。要提出反映客观事实的研究问题，自主意识、独立思考是研究者观察、提出问题的必要前提，也是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管理研究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只有做到仅考虑学术的内部准则而不受任何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能基于公共意识、理性精神和批判的态度，进行自主的、独立的、学术自觉的观察与判断，把中国条件下特定情境下的现象、问题和现有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做出独立的学术贡献。

“可证明性”是指问题大小适当且正确，问题、概念界定清晰。

问题、概念或变量之间的潜在关系表述是清楚的，整体研究设计用清晰的明确的术语隐含了研究要探讨的内容、问题陈述中所隐含的前设以及研究所期待的结果¹²。理论建立在问题基础之上，通过问题把概念、命题、假设、变量连接起来。如果问题、概念没有很好地界定，或者问题不正确即没有问对问题，将会导致模糊的研究命题或者假设，或者导致对于组织现象不正确的认识。不精确的概念还会使得知识难以积累¹³。要把问题把握得确切、恰当，概念清楚，以便能够根据这个问题发展出可以观察得到以及可以被测量的变量，进而变量联系起来形成命题或者研究假设使问题得以证实或证伪。在问题的边界界定过程中，要取得具体性和概括性二者之间的较为恰当的结合点，问题界定宽泛，会增加操作化过程中转化变量或者假设的难度，甚至会牺牲对于现象的准确的认识，而且很可能使得无法对于这个理论进行证明¹⁴。问题界定过于窄小，过于琐碎的细微往往会使得整个理论失去价值和意义。应考虑现有理论的有关定义、测量的可操作化、研究的方法类型等多种因素来界定问题，这将对研究者的科学素质与研究经验是一个考验。

一项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是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研究者并不注重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前提，结果所谓的“研究”成了空洞无物的经验或数据的科学包装物。事实上，研究者对既有理论的把握可以使研究者的更加敏锐，更加容易捕捉问题，有助于形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洞察力及思辨性及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

实证研究并非只限于事实和数据分析，而是与理论密不可分，研究的立论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支持。问题的来源、假设的提出、命题、变量间关系的分析、论证与检验，都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相关学科的知识，必然涉及到现有的理论或命题，在现有理论或命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发现尚待解决的问题，证实的假设或理论往往是在否定或修订前人的假设或理论后形成的。理论只是暂时性的真理，知识的发展只能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理论则只是这一过程中的某种逻辑演绎或归纳而已¹⁵。理论建构过程即整理、继承知识和创新发展知识过程。一是其解释性不断经受检验，二是在现有的成果基础上获得发展。因此，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就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人或其他人既有理论成果，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现有理论和已被接受的理论是中国情境下管理研究的基石。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的研究可以为后人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理论基础可累积前人研究的知识，并与目前将进行的研究做整合，以便对现象作更佳的解释。建立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并且运用已有的管理模型作为起点，通过与现有文献中的模型、理论和概念相联系，新的发现就可以扩展，增加甚至可能修正我们对管理的认识，使我们对全球管理的认识更加丰富¹⁶。因此，文献的类型、数量以及研究者对文献的把握程度都可以表明该研究项目是否处于一个宽厚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者本人的理论功底是否扎实、该项目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

在目前阶段，作为一种转型期间的过渡，要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发展体系，需要有“拿来主义”的指导思想，学术的“殖民主义”更多地应该适用于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上¹⁷。其实，我们同时不应拒绝西方管理学的丰富的理论资源，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这些理论所造成的“意识形态霸权”¹⁸，另一方面，应该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的面对其理论贡献和学术价值，以“为我所用”的求真务实精神，借鉴西方管理优秀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背景下特定的问题，才能最终形成我们中国管理学的学术命题及学术话语。

4 嵌入性与情境化

管理研究中的情境即为“与现象有关并且有助于解释现象的周边环境，通常是那些与超越研究中的分析单位有关的因素”¹⁹。情境因素的研究即把组织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情境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特征这些因变量的影响²⁰。情境因素无论作为自变量还是调节变量已经明显地成为理论建构的因素，这个定义与嵌入性的概念相关联。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指经济行为和结果受行为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其整个关系网络的结构影响，现实发生的企业活动和行为并不是脱离社会背景和环境而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网络之中的²¹。因此，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情境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必须是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因素，因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定情境下，企业的形成及企业成长也必然呈现制度、文化、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的嵌入性。因此，构建中国管理理论必须进行嵌入性研究。

4.1 制度嵌入

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一方面，政府致力于培育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转变需要在构成制度的复杂的规则、规范、法律和行为上的逐步改进²²，因而现有和原有制度和规则仍然会发生作用。即传统计划制度结构与市场化制度结构在同一政治体系中共生，虽然市场机制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权力与市场共同参与资源分配；再分配权力仍然控制着诸多领域，企业获取资源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原有的计划制度结构，市场竞争的诸多规则要比大多数西方经济更加难以预测²³。“制度空缺”迫使管理者依赖私人关系来替代正式的制度支持²⁴。因此，对于企业存在的大量不规范的交易行为，如果不从转型经济下制度嵌入的角度，把制度由一个“外生变量”作为“内生的”因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设定，其理论是难以具有解释力的。

4.2 文化嵌入

“在分析中国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行为及企业内个体的行为时，不仅要考虑现代政治经济和新兴制度，更不能忽视其文化根源的影响”²⁵。在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行动者对什么样的行动才是适当的文化理解为经济行动提供稳定性与意义；并影响着行动者行动策略、预期与行为²⁶。价值与规范、网络结构、国家及意识形态等，都是影响各种竞争场所包括市场、群体、组织等等中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共同理解的因素²⁷。中国在经济转型其制度呈新二元结构，市场和计划的双轨制度依附在由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共有的价值系统、习俗及习惯等构成的非正式规则之上。社会制度结构中法律文本意义上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具有明显的“不一致性”。在社会交易行为中起有效作用的还是非正式规则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或礼俗社会，由传统儒家伦理所支撑的习俗和惯例的秩序、规则在调节中国社会秩序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缺乏法治精神，人治的因素不仅造成了制度的软化，而且为政治权力的全面扩张和渗透提供了机会，障碍了社会的发展，使政治权力和人际关系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的行为可预测性是建立在上下有序的礼治的基础上的²⁸。

由于东西方文化在认知逻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基于新教伦理并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上的西方管理理论对中国特定文化的企业行为可预测性是有限的。中国管理研究必须将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分析的框架，才能对特定语境条件下的集体行动和企业选择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无疑是管理研究的重要变量。

4.3 社会结构嵌入

经济行为嵌入于其网络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且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会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²⁹格兰诺维特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并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在中国背景下社会关系呈“差序格局”³⁰，大部分基于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从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呈现的特征：1、人际信任而非制度信任；2、人际关系成为配

置资源的主要力量；3、人治的泛滥削弱了制度的效力。由此，嵌入性研究可以得出一些现象的深层解释：人际信任可以透视中国企业集群与企业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这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社会下企业联盟、合作的规模；从关系成为配置资源可以揭示转型经济下中国一些企业绩效的来源³¹；人治导致企业交易中高昂的交易成本等。

5 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学术对话

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使得衡量非经济因素对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的研究难于操作，所以嵌入性与情境化研究需要演绎性地建立有关因变量变量调节作用的假设。然而，企业与个人行动即受到基于理性选择及效用模型下的经济假设的驱动与支配，又受到多元非经济维度（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的影响，从而使研究问题变得复杂纷纭，其问题是单单依靠一种视角不能得到解决和分析的“乱题”，必须从多元视角观察问题³²。与其相关的是，情境化研究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框架，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

因为个体行动是嵌入在传统文化、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体系中，所以，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呢？只有进行在专门化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才能进行嵌入情境研究的有效分析，从而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可见，中国情境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理论基础与新的理论预设。开展中国本土情境的管理研究，必须对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等调节变量进行深刻的理解和解释及界定。视角过于狭窄和单一，根本无法深刻全面的对种种现象和相关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近年来，多种相关学科发展为更好的理解和解释中国转型经济下的特定现象提供了难得的方法和工具。

首先，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为情境化研究提供理论前提并对经济学提供了补充性解释。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成本收益度量、基于交易费用的现代企业理论为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对转型经济制度变迁及对微观主体行为解释给出了重要线索，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兴起把文化因素作为制度纳入分析框架，而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本分析为企业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借助数学学科的手段，使得管理研究超越直觉思维走向精确等等。

新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旨在管理学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内，融合多学科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通过与现有文献中的模型、理论和构念建立联系，收集真实、准确的本土数据。建构一种既能揭示制度、文化、社会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又能对本土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合起来的完整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中国在传统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地区国家大相径庭，企业结构与行为与西方发达经济中的组织也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管理研究的进路不应该是简单的照搬、模仿西方研究成果，而应该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把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的作为重要变量，研究本国问题，提炼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概念、理论，检验或建立能够解释并预测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特定现象的理论。

突破学科化的思想学术方式，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当代学术思想³³。只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哪一个学科的“专利”都可以移植过来。问题的发现、探索及解释是理论研究与建构的中心，应该围绕问题本身来建立跨学科对话，融贯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建构和发展出具有中国本土经验的管理学理论，逐步纳入世界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知识体系。

Management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ing Route in Chinese Background

Guo-qing ZOU, Xiang-fei GAO, Jia-shuo XU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domestic firms, grounded management theories in Chinese background need to be constructed urgently. Constructing management theory in Chinese background must go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isting in strict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methods; Strengthening question consciousness, oriented by scientific questions and on substantial basement of theory; Embedded in realities of China and doing grounded research; Regarding institutions、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s important variables. Consequently, we should focus on questions and develop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o as to make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 even to the world.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theory construction; ground embeddedness; questions; interdisciplinary

收稿日期: 2007 年 2 月 13 日

-
- 1 Blalock, H.M. 1968. Theory Construction.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 2 Bacharach, S.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6—515.
 - 3 参见 Wallace, W. 1971. *The Logic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 4 参见徐淑英, 欧怡: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5 参见 Bernal, J. D. 1939.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Routledge, London.
 - 6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版。
 - 7 参见 Weick, K.E. 1989.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16 ~ 531.
 - 8 参见 Tsui, A. S., Zhao, S., and Abrahamson, E. 2007. What to study in China? Choosing and crafting important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3(2): 171 ~ 181.
 - 9 参见 Desrosiers, E. I., Sherony, K., and Barros, E., et al. 2002. Writing research articles: Update on the articles review checklist. In S. G. Rogelberg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459 ~ 465, Blackwell Publishing.
 - 10 参见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版。
 - 11 参见 Ofori-Dankwa, J. and Ricks, D. A. 2000. Research emphases o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 or similarities Are we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6: 172 ~ 186.
 - 12 参见 Baker, M. J. 2000.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The Marketing Review*, 1(1): 61 ~ 75.
 - 13 参见 Osigweh, C.A.B. 1989. Concept falli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 *Academy Management Review*, 14, 579 ~ 594.

- 14 参见 Bacharach, S.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6—515.
- 15 参见陈秉璋:《社会学理论》,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
- 16 参见徐淑英,刘忠明:《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17 参见谭劲松:《关于中国管理学科定位的讨论》,载《管理世界》2006年第2期。
- 18 参见 Becker, H. S. 1986. *Writing for Str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 Cappelli, P. , and Sherer, P. D. 1991. The missing role of context in OB: The need for a meso-level approa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3: 55 ~ 110.
- 20 参见 Cheng, J. L. C. 1994. 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knowledge in organization science: Implications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Management Science*, 40: 162 ~ 168.
- 21 参见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91(3): 481 ~ 510.
- 22 参见 North, D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3 参见 Hoskisson, RE. , Eden, L. , Lau, CM. , Wright, M. 2000.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249 ~ 267.
- 24 参见 Li, JJ. Poppo, L. , and Zhou, KZ . 2008. Do Managerial ties In China Always Produce value? Competition, Uncertainty, And Domestic Vs Foreign Firm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 383 ~ 400.
- 25 徐淑英, 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 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载《南大商学评论》2006年第7期。
- 26 参见 Hamilton, GG. , and Biggart, NW.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 52 ~ 94.
- 27 参见 Evans, P.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8 参见季卫东:《法制秩序的建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29 参见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91(3): 481 ~ 510.
- 3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重印本)。
- 31 参见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 32 参见黄速建,黄群惠:《中国管理学发展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 33 参见余虹:《当代学术思想七人谈》,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2日。